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传播与 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

周俊华 李铭¹

【摘要】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是构建合法性的有效工具，边境地区通过“政治现实符号化”和“政治符号日常化”的连接，使边民的国家认同在边民与国家政治符号体系的交流互动中建构起来。通过国家政治符号系统围绕“理想政治模式”在边境地区展开的合法性叙事，将以制度认同、政策认同、身份认同等方式构建边民的国家认同。边境H县国家政治符号传播的整体情况较好，党政领导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思想上很重视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工作，政治符号传播的场域较广，种类也较为丰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方面突出重点，该县边民对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家政治符号关注度和认可度较高，对中华民族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度较强，能够较为自觉地捍卫国家利益，对祖国的繁荣富强认同感较高。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提升：拓展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的场域，创新传播的媒介与载体，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坚定边民的政治信仰，持续贯彻落实兴边富民政策增强边民的政策认同，增强基层治理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现实基础。

【关键词】国家政治符号 合法性 边民国家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22) 03-0116-11

在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之内，地处国家疆域边缘的边民，其国家认同的强化，离不开国家中心话语在边境地区的有效传播，国家中心话语蕴含的政治权力意义，以及国家在边疆治理中所承担的主导性角色和主体性地位，决定了其必须成为边民国家认同塑造的核心力量。国家政治符号就是国家中心话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作为国家疆域范围内通用的公共政治符号，通过有效载体、媒介和传播途径，能够动员和推动国家内部成员之间的政治交流，凝聚多元主体的目标共识、责任意识，统合价值理念，聚合政治认同，将不同地理环境、文化习惯、生活方式的成员有机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统一在国家这个政治屋顶之下，达到有效地整合边民社会、增强边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实现现代国家建构的目的。因而，研究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传播与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对边境地区地方政府如何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推动国家政治符号的有效传播，重视边民国家认同的构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运用符号学理论、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理论对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与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阐述，分析了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与边民国家认同增强的生成机制与机理，阐释了边境场域中边民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与机制，并提出建构边民国家认同和政治信念的建议。

一、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是构建政治合法性的有效工具

（一）国家政治符号及其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联系

作者简介：周俊华，女，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云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学和边疆治理研究。李铭，男，昆明医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大健康领域、中医药和思政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基于数据分析的西南边境县（市）治理方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XZZ005）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政治符号属于政治符号中最重要的一种，它包括将抽象的国家具象化的物品（如国旗、国歌、国徽、宪法、法律、条约、口号），国家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总和（如纪念日、仪式、纪念碑、纪念性建筑物、勋章、主流歌曲、制服、雕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四美”“三热爱”）等，广义上讲，还包括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政治形象、特定时期国家发展战略或方略（如改革开放方略、依法治国方略、西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以及向全国发出的国家动员（如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等内容。国家符号是政治生活的产物，又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表现形式，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标示政治象征、形成政治态度、激发群众情绪、产生政治信仰、支配政治行为、促进政治沟通的作用。只要能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的一切有形或无形、动态或静态的象征符号标识，都可以看成是国家政治符号。

国家作为最大的政治权力主体，基于政治治理的需要，必然有意识地塑造或控制政治意义的产生过程，创建并利用政治符号向世界进行传播，对国民进行政治社会化，维护治理的合法性。政治属性乃是国家政治符号的主要特征。政治权力主体往往借助各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客观存在、自我发展、自我维护、自我表现、自我装饰。¹人类诸多政治现象表明，政治符号与治理合法性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进入自媒体时代，政治意义的符号化现象更为突出，政治价值的符号化表达形式及载体更为丰富和现代化。在这一意义上，国家政治符号成为治理合法性构建的有效工具，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的传播能够促进边民对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认同。

（二）国家政治符号的结构与认同功能

政治符号具有内在结构及其功能。查尔斯·皮尔斯在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将符号分为三类，“每一符号都是由其客体决定的，方式有三：一是具有客体的某些特征，因此我称之为图像符号；二是就是客体本身或者和客体有实际联系，因此我称之为标志符号；三是按照一定的习惯，肯定可以被解释为指代某物，因此我称之为象征符号”²。据此分类，笔者将国家政治符号也分为三类：国家政治图像符号或认知性符号、国家政治标志符号或规范性符号以及国家政治象征符号或信仰符号。国家政治认知类符号能够规训政治服从。如在边境合法性环境中增强认知性符号的传播能增强边民的政治意识，注意国旗、国徽、国歌在边境合适场域的“在场”，注重对边民进行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宣传，传播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经典名曲，重视边境区域纪念碑、纪念馆的政治价值传播，精心策划重要节庆和重大活动的仪式，关注仪式体现的国家尊严以及传播的政治价值。政治认知类符号是类比、模拟感官的相似性，通过感官体验，以及激发立体、多维、综合性的感受体验，实现受众的情感迁移，推及政治心理和国家想象，因而政治认知类符号的规训效果最有效。

国家政治规范性符号能够维系政治稳定。“国家统治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秩序若要长久维持，需要获得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为约束机制的各种法律、制度、规则体系等的支持和维系，我们称之为广义上的政治规范。”³在指示性符号中渗透政治规则就转变为政治规范性符号。在边境地区，指示性符号出现的场域较多，人们注重在其中负载维系政治秩序所需政治规则，既能约束边民的行为又能够建构边民的政治认同，对边民能够产生观念约束，控制其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治规范。政治规范性符号在边境场域的恰当“在场”，如在界碑、国门口岸、国门学校、国门医院或卫生室、边境主要通道悬挂国旗，以明确宣示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与神圣不可侵犯，警示国家地理边界。对外可以起到警戒民族国家边界和政治边界，国家政治符号提醒着邻国边民，中国主权的完整性和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发挥政治规范性符号的边界秩序功能；对内可以宣示政治权力中心，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发挥政治规范性符号的等级秩序功能。

国家政治象征符号又称为规约性符号，即指社会约定俗成的。每一个政治系统都有内生的规约性政治符号，也可称为信仰性政治符号，其功能是建构系统内部成员的政治认同。每一个社会都有特定的文化基因，社会的存续依赖这些文化基因所繁衍的身份认同，从而铸就一个共同体的灵魂，这是一种精神特质。语言、习俗、价值和信仰都是特定共同体精神特质的要素，是共同体灵魂的体现，形成该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的标志。这种标志的形象化、美学化的呈现就是其独有的一系列象征符号。这是共同体发展历史中内生的，为成员所约定俗成。这种共同体长期内生形成的稳定而持久的政治信念体系，是一个政治系统的理想政治模式或愿景期待，是合法性信念系统，即国家政治信仰符号，属于政治系统较高层次。

（三）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传播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的传播，其政治意义更为突出，具体体现在其具有多方面的政治功能。第一，实现对边民政治人格的塑造。政治社会化是人学习政治知识和技能的过程，边民的政治社会化是国家有意识地塑造其政治意识的过程，以培养边民的政治人格。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的传播能够促进边民的政治社会化，塑造边民成为适应国家政治体系、政治生活的政治人，促进国家对边境地区的政治整合。第二，通过国家观念的建构增强边民的国家归属感。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的充分在场，会唤醒和增强边民的国家意识，从而增强边民的国家认同。第三，激发边民政治心理上的共鸣，调动边民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认知。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全方位的在场，通过对边民的感官系统产生刺激从而实现政治心理上的共鸣，激发边民按照国家建构的需要，塑造政治行为的标准，并通过对国家政治信息和方针路线及政策等的认知，调动边民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和政治归属意识，实现对国家的认同。第四，增强边民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在场能够唤醒并促进边民为国守土固边的自豪感和责任意识，产生一种由边而内的政治向心力和政治情感归属，在国家政治符号的象征功能促进下，边民自然地完成一种由“我在祖国的边境”到“我有守土固边的责任”的意识递进，从而实现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

二、国家政治符号传播与边民国家认同增强的机理

（一）以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为生成机制

国家政治符号承载着国家主流政治文化，表达着国家中心话语。国家概念所包含的共同性特质在于统治与政治，在国家在场的研究范式中，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中，个人、社会和国家与其说是分立的，不如说是共生的。个人在社会中、在国家中；社会在个人中、在国家中；国家在个人中、在社会中。一般而言，国家在边境场域中的“在场”，主要是通过国家基层组织以及国家在边境的管理机构作为国家代理人与边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关系的，如边境口岸、边防检查站、边境派出所、边民互市管理点、边境自贸区、出入境通道管理点等。此外，国家政治符号是另一种“国家”在场的符号体现。国家借助一系列官方与非官方媒介将代表国家权威的国家符号渗透到边民的地方社会文化空间，以其主导性、权威性、强制性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产实践。

边民的政治社会化实现程度取决于政治文化在边境地区的有效传播。从这一理论逻辑出发，象征着国家权威、代表着国家权力意志的国家政治符号，通过在边境地区基层单元，如边境县城各重要组织、公共活动空间、生产场域、场馆、口岸、边防检查站、派出所、界碑、边境通道等，以及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等乡村公共场域悬挂国旗、国徽以及政治标语，进行恰当的政策宣传，在边境地区推广普通话和国家通用文字，提倡边民参加国家纪念日仪式和重要节庆文化仪式，将特定的政治态度与政治信念注入边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国家政治符号与边民日常生活融合之后渗透到边民的意识之中并作为一种常识而存在，从而实现“国家”在场的目的。国家政治符号“在场”即是国家政治文化中政治符号文化在边境地区的传播，是边民对国家产生政治归属和认同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边境场域中国家政治符号“在场”从而促进边民的国家认同建构，这一生成机制是基于边民、社会与国家的一种共生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的传播能够促进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

（二）国家政治符号促进边民国家认同的机理

边境地区合法性环境需要价值输入，国家所拥有的符号系统对现实世界包括边境地区具有能动建构作用。可以将政治价值融入符号系统，构建一整套表达合法性信念的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故事、建筑、雕塑、艺术、制度、政策等国家政治符号系统，将之在边境地区进行有效传播，运用符号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建构原理，来促进边民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边民国家认同是指国家通过有效举措，在边境地区构建起广泛的国家共同体意识，让边民对国家产生心理归属和情感依赖，是一种积极的承认与赞同。⁴边民的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是一种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一种国民身份的自我识别意识和国家归属的自觉意识。一国之政治文化为社会个体的社会行动提供行为准则与价值理念，是影响社会成员国家认同的核心要

素。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的有效传播，使国家中心区域的文化与边缘的文化发生一种互动，增强边境地区的社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强化边民的国民意识，从而使边民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得到确认，国家政治符号蕴含的政治文化理念在边境地区输入，边民通过获得国家政治符号所输入的政治文化信息，实现政治社会化，相应的政治制度规范得到遵从，政治价值得到确立，在国家政治符号的感召下，激发边民内心的国家情怀和政治情感，建构边民相应的国民身份，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促进边民的国家认同。

国家符号在边境地区的传播，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政治现实符号化”的动态过程；同理，边民国家认同的增强，可以理解为“政治符号日常化”的动态过程。二者的连接即为政治符号对于政治实践的作用——政权体系对于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追求。“政治现实符号化”是指“话语权的掌控者对政治现实进行解释和定义的过程”，也就是使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念能够与政权体系的治理理念保持一致，并凝结成为相应的政治符号体系。“政治符号日常化”则是指政治符号从创制到表达的过程，基于政治现实的符号化进一步将政治符号和日常生活相结合。国家将政治符号注入边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塑造着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知和理解，以及与国家政治生活相适应的政治人格。由此，边境地区通过“政治现实符号化”过程和“政治符号日常化”过程的连接，使边民的国家认同在边民与国家政治符号体系的交流互动中建构起来。

（三）边境场域中边民政治社会化的机制

实现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各个因素的内在作用方式就构成边民政治社会化的机制。这一机制涉及三个基本环节，即政治文化在边境的传播、边民个体与传播政治文化媒介的互动和边民个体对政治文化的内化。

首先，政治社会化要借助携带和传播政治信息的媒介来实现。所以，国家主导性的中心话语在边境的传播是边民政治社会化的首要环节，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各场域的“在场”显得十分重要。其次，边民个体与政治文化传播媒介之间的互动是将政治文化与被社会化的边民连接起来的中间环节。家庭、学校、社会交往、大众传媒、职业群体、政权系统、政党组织、重大政治事件等媒介通过与边民发生互动，才会对边民产生影响，实现边民的政治社会化。再次，边民个体的内化是政治社会化的最终实现环节。在与各种传播媒介互动过程中，边民接触的政治文化实现了内化，即转化为边民自身稳定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行为模式。边民接受和内化来自于国家权力中心的政治信息越多，掌握的政治技能越多，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适应度越高，内心对国家的认同越强。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有效传播无疑是边民实现内化的重要条件。

三、国家政治符号在 H 县传播的现状

H 县是一个典型的边境县，笔者带领的课题组于 2020 年和 2021 年两次对该县国家政治符号传播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并通过对县委宣传部多位干部的访谈全面了解该县对国家政治符号宣传的总体情况。通过上述调研，形成对国家政治符号在该县传播现状的分析。

（一）国家政治符号在某边境县的传播现状分析

笔者和组长赵豪情于 2020 年 9 月 2 日—9 月 5 日前往 H 县调研。2021 年 1 月 13 日—1 月 17 日课题组在 H 县又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课题组在 H 县城火车站、汽车站、农贸市场、文化广场、口岸、边民互市、自贸区、街道等地发放问卷，并选取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医院、边防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及少数民族边民共 20 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次共发放问卷 498 份，回收 478 份，有效问卷 400 份，问卷有效率 80.32%。调查问卷对受访者的年龄、民族、职业、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作为个人基本信息进行了统计，共设计了 30 个问题。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显示，20 岁以下的样本 24 份，占比为 6%；20—39 岁的样本 184 份，占比为 46%；40—59 岁的样本 144 份，占比为 36%；60 岁以上的样本 48 份，占比为 12%。受访者的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其中中共党员样本 72 份，占比为 18%；共青团员样本 40 份，占比为 20%；群众样本 288 份，占比为 72%；民主党派样本为 0。当地民族主要是汉族和瑶族，其中汉族样本 232 份，占比为 58%；瑶族样本 120 份，占比为 30%；其余各民族样本 48 份，占比为 12%。受访者

的职业以农民为主，农民样本 152 份，占比为 38%；工人样本 72 份，占比 18%；公职人员样本 48 份，占比为 12%；服务人员样本 40 份，占比为 10%；个体经营户样本 72 份，占 18%；离退休人员样本 16 份，占比为 4%。从样本个人信息看，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1. H 县公共场域传播的国家政治符号

通过对 H 县城以及该县某乡政府以及村落等公共场域宣传的国家政治符号的统计，主要有国旗、国歌、国徽、国家领导人画像、国门标识；法律法规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门意识、核心意识；生态环境保护、垃圾分类处理；“一带一路”倡议、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兴边富民政策等宣传；党建、精神文明建设、守边固边、“五讲四美”“三热爱”等 6 类。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类标语标识和建党 100 周年标语标识符号最为突出，几乎是随处可见的政治符号。

2. 边民认知频率最高的国家政治符号

对边民“日常生活中您见过并认为能够代表国家的政治符号有哪些”的调查，让受访者对政策宣传标语（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识、国门标识等）、国旗、国徽、国产轿车、中国女排、政府标识等国家政治符号的常见形式进行总体评价，结果见下页表。其中边民认知频率最高的为国旗、国徽、政策宣传标语，分别为 74%、44%、40%；认知频率最低的为新闻联播、党政方针、宪法，分别为 12%、6%、2%。由此可见，H 县受访边民对直观、生动并贴近生活的国家政治符号的感知度高于宏观、抽象、复杂程度高的国家政治符号。

3. 边民最引以为豪的国家政治符号

根据调查问卷对边民“最引以为豪的象征国家的符号”的调查结果，受访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识、“国门”标识、国旗、国徽、国歌、天安门等国家象征符号的认同频次和频率见下页表。由表中数据可见，边民认同度较高的为国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识、国徽；认同度最低的国家标志性建筑和大阅兵。可见，边民对国家政治符号的认同度与日常生活中对国家符号的常见度、感知度呈正相关，即边民对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国家政治符号有更高的认同。

4. 边民对国家法律法规的认知度

在调查问卷对边民“最近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颁布时间”调查结果中，基本了解且能够正确回答的人数仅为 26%。但事实上笔者在调查过程中看到 H 县的县乡两级政府以及村委会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得很好，在口岸、跨境电商物流产业园、自贸区、农产品展示交易中心、边民互市等场域都专门设置了公共法律服务机器人，一点开就出来“云南公共服务法律平台”，服务内容非常丰富、规范，机器人还提供有中国法律以及东南亚 11 国法律的宣传内容。口岸还设置了“边检法律法规”宣传橱窗等。这说明，即便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得很好，但普通边民主动学习和深入了解法律法规的并不多。边民多抱着“需要用时再了解”的心态。说明除国家政治符号在场以外，主体的需求度是影响边民认知国家政治符号的因素之一。

表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民认知中出现的频次和频率统计表

序号	形式	频次	频率
1	政策宣传标语	160	40%

2	国旗	296	74%
3	国产轿车	64	16%
4	中国女排	56	14%
5	国徽	176	44%
6	政府	112	28%
7	公职人员	88	22%
8	国家领导人画像	64	16%
9	党政方针	24	6%
10	新闻联播	48	12%
11	宪法	8	2%
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识	128	32%
13	“中华民族共同体”标识	64	16%
14	“国门”标识	64	16%
15	国旗	160	40%
16	国徽	152	38%
17	国歌	104	26%
18	天安门	80	20%
19	国家领导人	88	22%
20	鸟巢、人民大会堂等	24	6%
21	大阅兵	8	2%

数据来源：笔者对H县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5. 边民对政府主导的疫情防控工作的认可度

2020年以来爆发的新冠疫情给边境地区带来较大的冲击，H县也不例外，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科学部署下，边境地方政府均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各族人民在边境县政府的具体指挥下坚守国门，奋战在条件艰苦的边境线上，构建卫生安全屏障。疫情防控凸显了边境与内地的关联性，将边民与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此，调查组在问卷中专门设置了这方面的问题，问及边民“对我县的疫情防控工作及成果的满意度”的调查显示，认为很好的有76%。可见，H县疫情防控工作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较强，防控措施得力，防控体系完善，县、乡、村各级组织的疫情防控工作在边民中具有较高认同度。调查组在边境线一带调查时，了解到巡守在边境线的士兵和民兵很辛苦，开始时还没有基本的遮蔽设置，日晒雨淋，群众会自发地送给他们雨伞、矿泉水等表达关怀。

6. 边民对升旗仪式和国家重大节庆活动的参与度

通过边民对升旗仪式等国家重大仪式和节庆活动的参与度分析，既可以考察边境地方政府通过升旗仪式和国家重大节庆活动传播国家政治符号的成效，也可以由此了解边民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政治参与的热情。

在问卷中“是否亲自观看过一场升旗仪式并跟唱国歌”调查显示，仅有48%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参与。可见，县、乡、村各级基层组织对宣传国家政治符号、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重大节庆活动这一传播途径的重视程度不够，边民对此的认知也明显不足，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还未完全实现从“国家仪式”到“我们的国家仪式”的认同转型。课题组在H县边防检查站参观和访谈中得知，H县边防检查站长期坚持在口岸定期举行升旗仪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每次来参与的干部群众是很多的。2018年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公安边防部队集体退出现役，边防检查站转隶为公安机关后，升旗仪式缺乏专门队伍；加上目前由于口岸服务于对外经济合作交流和疫情防控的需要，扩建新的联检大楼，使外围空间有限，升旗仪式暂停，大楼建好后，应该还是会恢复这项活动。由此可见，边境各级组织对升旗仪式等是重视的，问题在于参与升旗等仪式的群众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由此可见，H县在宣传国家政治符号的重大仪式和主要节庆活动方面尚需增强宣传力度和设计意识，拓展重大仪式和重要节庆活动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重视仪式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调动边民参与这些重要活动的积极性和热情。

7. 边民认同度最高的国家政治符号

国旗是边境地区最重要最普遍的国家政治符号，在各边境县、乡镇和村落，国旗都是最重要的国家政治符号，县、乡政府，村委会，村小组，卫生室，学校和医院都一定要悬挂国旗。有的村每家每户都插国旗。国旗在边境地区彰显着边民国家主权的威严和边民国籍身份的归属。调查问卷中对边民的“边境地区悬挂安插国旗是否有必要”的调查结果中，86%的受访边民明确表示，在边境地区悬挂安插国旗能够增强自身对国家的认同感，8%的人表示“有必要，但不清楚意义”。H县各重要场域，包括汽车站、火车站、主要道路两侧、口岸、学校、边境通道、广场和十字路口宣传电子屏、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大楼、主要商业街、街道办事处、乡镇和村落等皆悬挂有国旗，有的还挂中国红同心结。此外，国家领导人的画像也是国家政治符号体系中的核心符号之一，有一些场所还挂有国家领导人的画像，调查组在H县某乡的部分村落调查中发现，许多村民家客厅的中心位置皆张贴着国家领导人画像。可见，张贴国家重要标识性符号在H县户外各重要场域和边民家庭中皆较为普遍。这表明，政治图像符号或认知性符号和国家重要标识性符号是边民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国家政治符号。

8. 边民对边境政策认同度较高

国家政策在边境地区的贯彻执行，将边民与国家联结起来，也即是说国家通过政策的制定、实施将国家对国民的福祉传递给边民，边民则通过对惠及边境的政策认同和利益获得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调查组在与边民的访谈中发现，边民补贴、边民互市、

医保政策等与民生相关的边境政策被边民提及的频次较高，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边民对惠及自身的边境政策的知晓度和关注度较高，对这些政策谈兴甚浓，调查中会主动与调查者提及这些具体政策，并告知他们由此得到的具体经济利益。这表明边民对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家政治符号关注度和认可度较大。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通过西部发展战略、兴边富民政策、脱贫攻坚战、新型城镇化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大力开发沿边地区，多项国家政策惠及边境各项建设和边民，实现了边境地区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云南省又在实施《云南省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村规划（2021—2025）》，开启沿边地区建设新征程。

9. 边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边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度高

根据调查问卷对受访边民“您认为自己是否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调查项的结果显示，94%的受访者直观上肯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调查问卷对边民“何时产生国民身份错觉”的调查项结果中，6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产生过这种错觉”，有 30%的人在“互市、做客、共同生活”时也会产生错觉，表明 H 县边民具有较为稳定的国民身份认同，但也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结合问卷调查及调查组针对该问题的原因访谈，受访边民的直观感受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影响，而这二者皆为 H 县传播最普遍的国家政治符号。可见，国家政治符号“在场”对边民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0. 对地方公职人员执法的认同和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

当被问及“当地政府、海关、口岸、派出所等机构和部门在当地打击犯罪、守土固边和管理社会等执法过程中是否代表国家”时，73%的受访群众认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执法行为代表国家，表明边民对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各部门的依法行政行为认同度较高。调查中笔者了解到，一定程度上，边民是通过地方及其公务人员治理活动的认同进而认同国家的，边民经常会将县、乡政府干部和村干部以及街道干部等视作“国家的人”或“公家的人”，在边民眼中，国家是具象的，国家主席、党中央总书记、中央政府代表着国家，一定程度上省、市、县、乡政府甚至村级组织也代表着国家。

调查问卷中“在边境小道上遇到非法越境、作奸犯科行为时的选择”调查项的结果数据显示，其中有 66%的受访边民选择报警，18%的受访边民则选择上前阻止。表明在国家利益立场上，H 县边民对国家利益和统治合法性维护的自觉性较高。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建构边境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保证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是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传播发挥政治整合功能的体现。通过国家政治符号的有效传播，有利于推动边民更加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拥护政府权威，从而形成以家国情怀为根基的国家认同意识。

11. 边民对祖国富强的认同感较高

在问卷设计中，课题组设计了“与邻国边民日常交往时的感受”这一调查项，旨在通过边民自身对两国边民生活状况的对比，研究 H 县边民深层次的国家认同。调查问卷的“在中国和邻国对比下，您最为国家感到骄傲的是哪些”调查数据显示，边民选择占比较高的依次为“国家富强”“安全感”和“经济发展”，分别为 52%、22%和 16%。

综上，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课题组在 H 县政府、乡镇政府、村落以及各重要公共场域的调查情况，以及对 20 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资料，可以得出基本结论：第一，H 县党政领导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思想上很重视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工作，H 县各主要公共场域的确比非边境县的县域在国家政治符号宣传方面更为突出，让人产生鲜明的边境县感受，让人明确地意识到“这里是中国边境某某地区”。第二，H 县国家政治符号传播的场域较广，传播的国家政治符号种类也较为丰富。第三，H 县党政领导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方面突出重点，重视了国家政治符号在政府门户网站、口岸、跨境电商物流产业园、自贸区、边境主要通道、县乡政府大楼、文化广场、国门学校、国门医院等重要场所的宣传。第四，H 县边民对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家政治符号关注度和认可度较高，对边境政策认同良好。第五，H 县边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边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度较高，对地方公职人员执法合法性的认可度高，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较为突出。第六，边民在与邻国比较语境中产生的对祖国繁荣富强的认同感较强。

（二）国家政治符号在H县传播存在的问题

虽然总体情况较好，但国家政治符号在H县的传播现状，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当前H县国家政治符号的传播未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创新传播途径和手段。除政府门户网站、口岸、跨境电商物流产业园、自贸区等城区重点场所运用了现代传媒技术外，H县在其他普通场域传播国家政治符号仍以传统的张贴标语、悬挂国家符号标识、橱窗宣传等传统方式为主，传播途径未针对受众的认知特征、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进行细化。如H县作为自治县，在县城汽车站、火车站、边民互市、文化广场、跨境电商物流产业园、图书馆等各公共场域没有用少数民族文字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传标语。第二，H县边民对复杂性、抽象性的国家政治符号关注度不够，对法律法规类的国家政治符号学习不多，既表明大多数边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学习和认知复杂国家政治符号能力相对弱，也说明政府和各级组织尚需对国家政治符号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宣传。第三，边民对国家政治符号的认同尚处于初级阶段，边民多关注到容易认知的政治图像符号和标志性政治符号，以及与个人经济利益密切关联的边境政策等，尚需重视培育边民更深厚的国家情感。第四，H县边民对国家重大仪式和重要节庆活动的关注度不高，尤其是远离县城的偏远乡村，边民对这些重要活动几乎没有观礼或参与过。第五，对远离城区边民的国家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不够，宣传中现代传媒运用不足，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形式未顺应边民的认知规律，突出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

四、建构边民国家认同和政治信念的建议

（一）拓展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在场的场域

要进一步拓展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在场的场域，扩大国家政治符号宣传的社会空间，延伸国家在场的范围，增加边民遇见国家政治符号的频率，从而强化边民对国家政治符号的印象，增进由国家政治符号产生的政治联想，进而增进边民的国家归属感和国民荣誉感。应重点增强国家政治符号在以下场所的宣传：边境地区的县、乡政府以及行政村和自然村的村务办理区域和公共文化空间；边境沿线的主要节点，如口岸、口岸货场、自贸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边检站及分站、界碑、边境通道等；政府、电台、学校、医院等重要组织和机构。

此外，学校是国家政治符号传播的重中之重，因为今天在校的学生是未来边民的主体。在边境国门学校、国门幼儿园、国门卫生院（室）、文庙等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场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国家认同教育，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增强政党认同教育。要积极引导边境地区的中小学生认清基本国情，加深对“四史”的学习和理解，了解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祖国繁荣昌盛的现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增强守土固边的责任感。通过正向教育赋予学生正能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二）坚定边民的政治信仰，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首先，依托边境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结合各边境地区的爱国主义史，如烈士纪念馆和战史馆、抗英纪念碑、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传统，讲好家国情怀的故事。在各地建设边民礼堂、公益电影院，以经典红色影片巡回展演、红色音乐会、历史话剧等形式宣传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保家卫国精神，将边境区域文化符号与国家政治符号相融合，建构边民的政治信念。其次，挖掘边境标志性建筑和历史文化遗迹的政治文化价值，增强边民的民族自豪感。这些建筑和遗迹承载着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感情，深入挖掘其中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升华和提炼出各地具有区域文化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政治符号，赋予新的政治文化内涵，将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能够增强边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历史自豪感，坚定政治信仰。

（三）加大边境地区重大节庆活动中国家政治符号和中华文化的宣传力度

注重引导边境地区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对接与交融，加强各民族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接和靠拢。各民族

文化均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民族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丰富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层次，同时，应以中华文化来提升各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品质，增进边境各民族文化间的“重叠共识”，以促进边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首先，采取边民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传播国家政治符号、中华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如红色文化墙、民族文化彩绘墙、文化长廊等，可以采取项目制的方式来建设。其次，既要传承和弘扬各民族传统节日，在节日活动中恰当渗透和融入国家政治符号，又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通过共同的节庆文化为纽带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边境县一乡镇一行政村三级举办国庆、春节、中秋等中华民族重大传统节庆活动，并注意在中华传统节日节庆活动以及地方重大民族节庆活动中增强对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增强中华文化元素的渲染和渗透，从而增强边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创新国家政治符号传播的媒介与载体，突出传播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

除去传统的媒介如学校、家庭、社会交往、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以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许多新传媒成为政治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形成了“互联网+”的多样化传播途径。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地区的传播要充分引入新的传媒技术，创新国家政治符号传播的媒介与载体。如H县边民互市门口和申报大厅宣传国家政治文化的电子广告牌较多，交替循环宣传，可视化和阅读性很强，跨境电商物流产业园的公共法律服务机器人一打开就出来“一带一路”倡议宣传、中国的法律法规及其智能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平台等，各种商务信息共享平台上也可以宣传国家政治符号，让边民随时可遇、随手可得。同时，在传播形式和途径方面要切合边境县的地域性和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充分利用各民族语言、文字、艺术和传统文化进行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

（五）做好政策解读工作以增强边民的政策认同

国家的大政方针、地方的政策规章是边民日常生活中接触度最高的国家政治符号，做好政策解读工作是加强边民政策认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提升边民国家认同的有效路径。国家政策的解读是否及时、到位对边民的国家认同影响较大。边民的政策认同取决于其是否准确地理解了政策及以对政策的认知程度。首先，边境地区的各级政府要完善好对相应政策的解释工作，建立专门化的政策解读员队伍，发展政策宣传志愿者，或借助乡贤、农村新闻官等，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边境各项政策，使边民将政策为何制定、如何制定、落实意义内化于心。其次，以乡镇为单位定期举办线上+线下政府工作答疑会，民众可将问题投入事先准备的意见收集箱中，由相应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答疑并明确问题解决期限，之后可将答疑会内容公示于街道、村镇电子显示屏及张贴于宣传栏中，由各级人大代表及群众代表进行监督落实工作。再次，在贯彻各项边境政策时，重视引导边民通过正确的今昔比较和中外比较，明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六）通过重大仪式唤醒边民的情感认同促进深层次国家认同的生成

当前随着政治文化传播从传统的政治传播范式向社会传播范式的转变，情感表达成为一种动员方式。情感作用下的政治文化传播路径是按照情感的唤醒与激发、情感能量聚集与情感共振、群体认同与情感传播实现的。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符号的传播应以建立边民的情感认同为基础，从而打通国家认同的建构通道，从而方能使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传播不流于一种形式主义的目标追求，真正培养起边民深层次的国家认同。要充分发挥升国旗、国庆庆典仪式等重大仪式在边民情感唤醒和激发中的作用。通过升旗仪式能够唤醒并建构国家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巩固政治信仰，进而强化边民的国家认同感。升旗仪式的规范、庄严，使国旗这一“神圣一象征”政治符号建构政治认同的功能更加凸显。如H县根据其县城地域面积狭小，地势陡峭，制定了县一乡镇一村三级联动宣传机制，以街道布置安装“大喇叭”，在文化广场、学校、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率先将升旗仪式列为日常事宜，政治文化的氛围很浓厚。边境各地可择优安排机关干部和群众和学生代表在国庆、国家公祭日、自卫反击战纪念日等在当地文化广场等重要社会文化空间举行大型升旗仪式，当地媒体进行实时播报。特定时间和场合升旗仪式产生的政治文化氛围能够激发边民的政治情感，激发深层次的国家认同的生成。

（七）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现实基础

贯彻共建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加强地方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制定各民族共建共享原则和理念，着眼于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从治理实践层面增进边民的国家认同，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现实基础。对于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而言，政府要重视解决他们最为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农业产业及就业等民生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从社会心理层面保障边民的国家认同不断提升。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精英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与机制，拓宽参与渠道，创造参与条件，提升参与技能，创新参与的平台等。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共同参与边境地区的基层治理，以重大决策参与、社会治理参与、过程监督参与等方式，发挥他们在当地民族公共事务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继续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加大边境地区建设现代化小康村的步伐，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优先保障沿边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边境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提高边境地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健全村级治理体系，提升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尤其是抵御防范重大风险和灾难的能力，从而为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现实基础。

（八）培育边民深层次的国家情感和情怀

要注重引导边民在历史比较中去发现今天的幸福，在与境外边民的横向比较中去感受作为中国国民的幸福，在与发达地区的比较中去确立今后发展的目标，正确定位与国民身份相应的权利和责任，明确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

边民国家认同的增强需要从根本上培养边民的国家情感和情怀，边民国家认同的层次提升需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寻求共有精神营养，要不断增进边疆与国家腹心区之间的紧密联系，培育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的内在精神，凝聚核心价值，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当前中国边民国家认同的构建工作仅处于基于对边民现实生活需求的供给和回应，从而赢得边民认同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边民较高的国家情感和情怀培育尚需时日，这一点必须在今后加强边民国家认同的工作中加以高度重视。[2020年7月，本文第一作者指导的赵豪情小组申报获得云南大学2020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社会调查类项目，项目号202001086），并于2021年4月结题。此论文的传播现状分析部分运用了该项目的调查数据资料，特此说明。]

注释：

1 [英]特德·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2 T. Sebeok, *A Perfusion of Sig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6.

3 张敏：《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学海》2021年第3期。

4 袁明旭、邹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再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